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

# 塘村老人

杨晋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

# 塘村老人

杨晋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塘村老人/杨晋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004-9729-5

I. ①塘… II. ①杨… III. ①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②老年人-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C912.82②D6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943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陈 瑶

责任校对 周 吴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84029453 传 真 010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4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 编 周 宁**

**编 委 朱水涌 詹石窗 钱晓鸿 彭兆荣  
李无未 王日根 刘泽亮 曾少聪**

# 应运而生、大有可为的老年人类学

## (代序)

杨晋涛博士的著作《塘村老人——变迁乡村中的晚年、家与村落》，很可能是中国第一本非常明确地以“老年人类学”为主题的民族志专著，因此，它的出版问世应该说是中国人类学领域里又一项崭新而又非常重要的收获。杨晋涛自1999年起，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课程时选定了老年人类学这一研究课题，而后在2002年6月通过的博士论文答辩中，以及后来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教中和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访学中，他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的老龄化问题，积极从事与老年人类学相关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其滴水穿石、厚积薄发、孜孜于学术的精神很是令人感佩。现在，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的这部大作即将和读者见面，我重读书稿，觉得它经过长期的切磋琢磨和反复修改，比起八九年前答辩通过时获得好评的博士论文来讲，更加成熟并有了“质”的提升，因此，我为作者的此项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人类学本是一门关注人及其文化的学问，它从较早时起就非常关注有关“年龄”的研究，例如，在有关亲属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老年人的内容；或通过对某些文化中存在的“年龄阶梯制”的研究，揭示以年龄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或政治体系（例如，长老政治）的原理，发现年龄在权力关系中所发挥的影响等。古典人类学曾深刻地揭示过老年人在所谓“原始社会”中的角色，诸如在族群的传统仪式、习惯法体系和权力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传承生计智慧和社会领域的诸多知识

以及关爱下一代等。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西方各发达国家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凸显，于是，也就应运而生地在人类学领域里发展出老年人类学的分科方向，出现了对不同社会与文化里的“衰老过程”和人生历程的“晚年”阶段从事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的年龄组群进行更加深入和专门性探索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美、英、日各国那些以老龄化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的老年人类学家们，极大地拓展了对于他们本土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的社区田野研究，致力于开发本土民族志方法来揭示和理解发达国家自身的老龄化、社区传统和老年人晚年幸福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便使西方社会文化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定义及认知相对化，并由此展开各种必要的反思，可以说也是西方老年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总体性特征。

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全球化成长，各国的老龄化问题相互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老年人类学也在国际人类学界逐渐成为热门的学术话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其下设置了“老龄化与老年人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此后在历届世界大会举行期间组织了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并创办了《跨文化老年学学刊》和《人类学与老龄化季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老年人类学的学术论文，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老龄化现象的不同背景，老龄化在不同社会中呈现的文化差异、衰老过程和衰老经验在不同社会或文化里的意义及其和性别等因素相关的衰老体验，比较不同社会对各个年龄组群人们的分层、规范和地位给予的界定，不同文化对老年人社会地位给予的制度或非制度性的安排，以跨文化视野应对老龄化，家庭健康与老年人关爱，东亚的孝道和社会变迁对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影响，等等。老年人类学的这些课题反映了它追求真理和学问的独特方式，其所涉及的界域内涵丰富而又宽泛。所有这些研究均倾向于揭示出人类社会在生命周期的文化建构方面，在如何定义、感受和应对老龄化及老年人方面，实际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和变异。但除了揭示和强调文化建构的差异外，也有一批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复数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在界定或规范衰老和老年人时也经常可能共享的亦即最为基础并具有一定普同性的指标，例如，证据显示有很多社会和文化都把人在社会生活里的角色转换（以子女的婴孩出生为转折）或家庭经济结构里的角色转换（开始接受而

不是给予更多，正如本书所描绘的“称粮”习俗那样），视为是进入老年阶段的标志。

衰老是人类个体生活史无法回避的经验和不可逆转的流程，它既是一个生理变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过程；晚年是生命周期或人生的基本阶段，其中充满着文化意义的建构和社会制度的安排；死亡作为衰老过程和晚年的终结，则是任何社会与文化均必须设法予以应对或接纳、消化的最为重要的生活事件。老年人是任何社会与文化均必然存在的年龄组群，其社会地位、职能及其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均不能等闲视之。在既定的社会或文化里，相同年龄组群的人们往往可能拥有一些相近的人生经验，并因此具有一些近似的记忆、情感和认知，而在不同的年龄组群之间既可能形成辈分差异和代际隔膜，也可能构成文化传承的链接和社会体系的延续。由于老人人类学对上述诸多问题的研究，能够极大地丰富人类学对于人、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理解，因此，它也堪称当代人类学中最具潜力和前景的分科方向之一。但是，相比较而言，老人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却还非常薄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晋涛这部著作确实是具有填补空缺的意义，它把中国人类学对老龄化与老年人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家在面对中国与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时所应持有的学术责任和担当。在我看来，本书的学术成就正是在于它为当前中国的明显具有人口学偏重的老年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富于洞见的文化人类学实证研究的范例。

经过长期不懈的学术追踪，杨晋涛对国外老人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了系统和颇为全面的掌握，对海内外相关的学术文献也作了颇为细致的梳理，在认真地探讨和汲取了老人人类学的基本学术理念和主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路。本书的主题是要探讨老年人和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通过田野工作的实证研究和民族志的翔实描述，恰当地论证了他的基本假设，亦即在快速变迁的中国乡村社会里，老年人乃是积极的行动者和实践者，他们凭借所能掌握的资源，不仅对于形塑自己的晚年生活、维系生活的连续性具有积极的能动性，而且，他（她）们还能够通过不同层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乡村社区层面的多种实践活动，去适应、影响、参与甚至创造环绕着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进程。此种强调“实践”理念和老年人能动性的老人人类学的立场，和

早期人类学曾经过于强调社会结构或文化模式对于老年人或其他任何年龄组群人们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同时，本书的观点也和老年学的很多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把老年人视为负担，视其为被动、沉默、缺少自我主张的弱者之类的刻板印象构成了很大的反差。

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在本书的研究中积极采借了国外老年人类学的“生活过程”理论作为自己的分析框架。采借西方学者开发的理论框架进行中国本土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家的一个聪明的研究策略，实际上，这样做也是需要谦虚的精神、精到的研究和纯粹出自于学术的考虑，既不应是“拉大旗、做虎皮”，也不应是偷懒或随意的敷衍。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生活过程理论在本书作者看来，乃是比较适宜于用来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采借它比较有利于达成本课题所试图接近的学术目标的要求。在我看来，这种积极采借的态度和很多年前吴文藻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中国积极导入功能主义人类学时的姿态如出一辙。对于多少具有“舶来”属性、晚起后进、需要急起直追的中国人类学而言，此类基于全面了解的采借将有助于中国人类学家得以在相同的学术平台上和国际人类学进行直接的对话。通览全书，读者不难发现，在这一项具体实证的田野民族志的研究中，尤其是通过对一个中国乡村里的社会文化脉络和老年人日常生活及其实践活动的诸多细节的详细描述，作者很好地表述了他的“文化观”和“老人观”，也几乎是在不输于国外学者的水准上深入讨论了老年人类学所关心的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从而也为今后老年人类学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示了一个可靠而又富于创意的中国本土个案。既有中国个性，又有国际水准，这就是我对杨晋涛这部老年人类学性质的民族志专著的基本评价。

本书反映出作者曾系统地接受过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同时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实践方面，也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通过在四川省一个普通乡村——塘村进行的颇为标准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等，杨晋涛“发现”了许多来自田野的事实，进而以这些事实为基础，他细致地描述和深入地分析了塘村老年人的生活。

作者生动描述了塘村老人们的“衰老过程”及其正在经历着的乡村各种变迁的具体情景。在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已经导致出现“过疏化”现象的塘村，老年人必将经历的一系列人生大事均可以成为他们逐渐走向

衰老、“成长”为老年人的标志性事件，诸如为儿子操持结婚、分家（包括家屋的代际分配、析产、分灶、户口门牌的区分）、成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成为诞辰寿礼上的寿星、“称粮”（失去劳动力，开始由诸子绝对对等地负担和供养）等，其中分家和称粮最具重要性，前者意味着家庭发展的周期性裂变及其伴生的父辈权威地位的弱化，后者则是社区、家庭和当事人对生理衰老过程的一个最为明确、简洁的相互确认，也可以说是乡村文化对衰老的认定。塘村的养老方案除了称粮，还有“吃转转”、“各养个”、“独子不分家”、“招郎”等，通过对上述诸多习俗性赡养制度的研究，作者阐明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其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揭示出在乡村“孝道”的行为结构中蕴涵着的乡村“人观”原理和代际人际关系原则，这里所谓“人观”是指乡民们对“理想的”（或像样的）老年人和“孝顺的”晚辈所分别持有的乡土观念或基于孝道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想象，而所谓代际人际关系原则，则主要是指晚辈“供老人”的义务和老年人“公平”（不偏心）对待子女的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杨晋涛认为，如果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中晚辈的赡养义务和老年人的公平责任基本上是均衡的，那么，老年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得到基本保障；此种物质方面的保障构成了乡村孝道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乡村孝道还有进一步的表意或象征层面，诸如“尽孝心”的馈赠和“言语”上的尊重等。

虽然社会变迁和乡村诸种习俗之间的综合作用，确实导致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代际冲突和交流的阻隔也使乡村老年人的受尊重感有所降低，但乡村文化通过对孝道和“尊老”行为的强调，也多少缓解了老年人的不满和失落。在乡村的孝道结构中，其实也预留了老年人作为行动者能动性地参与建构其生活连续性、甚至进而参与建构乡村日常生活秩序的空间。老年人拥有一定的“资源”可以支持自己对晚年生活的某些安排，诸如情感资源、习俗资源、社区舆论资源等。老年人通过“能做”（勤劳）、“有本事”（能力）和情感等方式对家庭生计和家庭关系的成功经营，不仅可以很自然地转化成为他（她）们晚年生活的“资本”，同时也构成他（她）们在老年人“圈子”（亦即所谓“同期群”）或乡村社区内“声望”的源泉。较为智慧的老年人一般总是善于利用或借重家庭内的感情因素，包括祖孙间的感情纽带，培养、适当地表达或控

制表达感情，都是可能被老年人用来建构有利于晚年生活的策略。

在塘村及周围乡村，既有村民委员会下设的“村老年协会”作为解决和老年人相关的纠纷、宣传和促进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准官方机制，更有以“打牌”为主要活动内容、亦即作为娱乐场所的“老年协会”，应该说它们对于保障老年人在乡村社区层面的群体性活动和基本权益都是非常正面的。在超出家庭层面的社区，老年人的圈子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虽然圈子内也会有涉及声望的各种竞争，虽然老年人确实更像是弱势群体，但老年人的圈子却在乡村有着相应的影响力。例如，它会通过“辈分”原理和养老习俗等来维持老年人在社区内的权威和利益，也会为老年人的“说空话”（发牢骚）、“摆龙门阵”（聊天）和“打牌”（通过打麻将交流和娱乐）提供基本的支撑，并促成甚或控制一定的社区舆论，实际上，它意味着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而在乡村社区里“若隐若现”地存在。虽然在老年人的圈子中，不同个体的地位、声望、影响力多少会基于其家庭经营的成败、个人性格和各种日常生活实践而有相应的差异，但老年人在圈子内的各种活动，均具有社会交际、适应变迁、彼此认同、获得声望等方面的意义，它们均与其晚年生活所必需的积极因素和意义有关。此类圈子为老年人提供的活动空间，通常是家庭所不能提供的。

杨晋涛在本书中对于塘村老年人的“走庙”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所谓走庙，亦即参与以乡村庙宇为舞台的各种民俗宗教活动，在塘村及周围乡村，走庙基本上是老年人的群体性行为，它在村落及跨村社区（地域社会）的层面上展开，并形成了某种轮值互访的体系。作者把走庙看作是老年人适应、进而参与和创造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的确，如果我们把乡村民俗宗教的复兴视为“传统”的再创造，那么，推动此种复兴和民俗宗教再生产、再创造的主体正是乡村的老年群体。在塘村，老年人走庙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为老年人自己创造出社会交往的空间和各种可能性的有价值的活动，通过走庙及相关的请佛、念经、唱“佛句”（近似于一种地方歌谣）、摆龙门阵、娱乐等诸多活动，老年人可以克服因为家庭代际交流缺失而产生的孤独感和落寞感，换言之，走庙具有让老年人“宽心”的效果。经常相约一起走庙的老年人、特别是在女性之间，能够因此形成更加亲密的同期群关系，这在她们的相互称谓中有所反映。老年群体的集体记忆、彼此交流和相互倾诉的需求以及他

(她)们对过往生活和传统价值的眷恋、怀旧等，均是促使乡村走庙行为日益兴盛的动机，很多老年人也由此重新获得了晚年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其次，通过重温他（她）们的信仰及其与神圣世界建立起来的联系，老年人也能够从其与超自然存在的精神关联中获得必要的心理慰藉。实际上，老年人晚年生活将不得不面对的病痛、残障乃至死亡，正是他（她）们比乡村任何其他年龄组群都更加关心“来世”、并寄托祈愿于民俗宗教的更为内在和深刻的缘由。再次，在走庙活动中被反复吟唱的“佛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老年人的文化表述行为，其内容多为对苦难人生的复述、“劝善”和涉及孝道的说教，它们无疑都是以重建和强化乡村的孝道意识形态为指向的。老年人在此种利用传统资源而对现实生活秩序的建构中，由于利益直接相关，自然也最为积极。总之，通过走庙之类集体性的活动和实践，塘村老年人不仅以年龄相近的同期群为基础建构起了具有各自主体性的同好者圈子，彼此间形成认同感，甚至还初步形成了某种准民间组织的形态；进而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他（她）们作为具有接纳变迁和改进自身生活及其社会地位之能力的主体，由此也参与甚或形塑了乡村社会的部分变迁，并在乡村孝道意识形态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秩序的形式及意义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年人的走庙活动不仅是乡村民俗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也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和丰富自身晚年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中国当代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乡村社区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内部的关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使乡村民众的观念构成和意识形态也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塘村的老年人并不是没有反应或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有所作为、有所适应和有所创造。本书对塘村老年人的各种实践行为及其后果、老人们所能借重和利用的资源以及老人们得以形成所谓权力或“社区声望”的路径等，均作出了必要的研究性分析。杨晋涛指出，塘村社区倾向于认定某些行为属于老年人，而在老年人的圈子内则存在着声望竞争的若干不同方式，并形成了一定的权威体系。探讨老年人的社区声望类型，有一种“干部生涯型”声望，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渗透到基层乡村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当事人往日的村干部经历成为其资本，尤其当乡村社区的民众利益需要由村委会等现行基层权力机构以外的人出面代表时，他们往往会作为非正式权威而站出来。当然，

乡村社会对于年长者和见多识广者的敬重，也是此类“声望老人”得以产生的土壤。但乡村还有民间自发、土生土长的声望老人，例如，通过对民俗宗教或民俗艺能展演等技能的掌握，通过对乡村社会交往、婚丧嫁娶、纠纷调解、亲属及邻里互动等乡土知识体系的掌握与提供咨询，当然也可以通过对家庭生计和其他事业的成功经营等不同的路径，均有可能在村落、跨村层面或在同期群的老年人圈子内形成一定的声望，从而有利于他（她）们对各自晚年人生的安排和设计。通过对这些声望老人主动地适应、参与社会变迁，积极地维系甚至重新发现其晚年生活意义的各种具体情形的叙述，本书的研究不仅做到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去理解老年人及其各种行为，而且，也做到了从老年人这一特殊人群的视角和立场去理解乡村的社会变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的老年学研究中有一种“常识”，倾向于把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下降看作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必然结果。当前社会上频繁发生着的拒绝赡养，无视、冷落、抛弃甚至虐待老人的诸多现象，似乎也为这一“常识”提供了依据。但杨晋涛则对这一似是而非的“常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他指出，把旧时孝道“浪漫化”或“理想化”的这一“常识”，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表层认知。通过塘村这一具体乡村社区里的田野事实和老人人类学的理论分析，杨晋涛彻底打破了这个“常识”，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又一项学术贡献。通读本书，读者自会感受到其中洋溢着人类学智慧洞见的地方很多，例如，作者重视乡土概念、民俗语汇和地方性知识体系，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假如允许我对杨晋涛博士今后的老人人类学研究提一些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有两点：一是乡村衰老经验的性别差异，或许可以在现有研究的延长线上做进一步的拓展。本书对此已有所关注，例如指出嫁走的女儿不负责养老，老年妇女极少“打牌”，走庙的老年人女性居多、男性虽少却往往成为“领头人”，等等。以我有限了解的日本社会的某些情形而言，男女两性的衰老经验和晚年生活有很大差异，诸如“熟年离婚”常由女性提出，男人退休在家可能被妻子视为“粗大垃圾”，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故其晚年几乎多出了近十年的“寡妇期”，然而整个日本社会对女性生命周期中“多”出来的这一段寡妇期却没有任何对应性的文化建构，

以至于有的日本学者甚至宣称，老龄化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女性问题。中国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在两性差异方面似乎也还较为欠缺，这类课题的深化反倒应该是老人人类学未来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二是基本上没有涉及与死亡和葬礼有关的情形，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本书的一个缺憾。乡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与宗教，特别是佛教和民俗宗教的亲密关系，直接或间接地与他（她）们始终并将越来越面临着病痛、死亡这一类挥之不去的困扰、苦难甚或恐惧有关。其实，中国的孝道传统除了“养老”，还有“送终”，甚至还包括死后定期的祭祀等，我觉得，这些方面大概也是老人人类学今后不应回避的课题方向。

作为全球性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城乡，目前都出现了大面积和持续性的“银色”（老龄化）浪潮，这个趋势和急剧的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越来越促使全社会把传统孝道的重建、重构看作应对老龄化困扰局面的必然选择，但与此同时，正如已有的一些老人人类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传统的养老模式和孝道意识形态的正面价值自不待言，然后，家庭养老方式业已捉襟见肘的现实，促使将老年人晚年生活也纳入其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强化和大面积覆盖，正在日益成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基本课题。诸多现实的压力和困难，将会使涉及老龄化和老年人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我相信，顺应时代变局和现实的社会需求，人类学尤其是老人人类学在中国一定是有广阔的学术成长前景的；同时，我也期待并坚信杨晋涛博士基于本书的成功，今后将会在人类学尤其是老人人类学的学术领域里做出更多的贡献。

周 星

2010年7月20日

写毕于日本爱知大学丰桥校区

# 目 录

应运而生、大有可为的老人人类学(代序) .....	周 星(1)
<b>导论 .....</b>	<b>(1)</b>
一 问题的缘起和意义 .....	(2)
二 国外人类学的衰老和老年研究 .....	(4)
(一) 学科背景 .....	(4)
(二) 研究方法 .....	(7)
(三) 生活过程理论框架 .....	(12)
三 中国老年研究概况 .....	(15)
四 本书研究框架和论题 .....	(18)
五 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结构 .....	(22)
<b>第一章 竹镇和塘村 .....</b>	<b>(24)</b>
一 地理环境、气候与农业 .....	(24)
二 移民史与方言 .....	(29)
三 “候鸟”的村庄和“守巢”的老年人 .....	(31)
四 基层组织与权威 .....	(33)
小结 .....	(39)
<b>第二章 老年人的范围和称谓、称呼 .....</b>	<b>(41)</b>
一 乡土定义和现代年龄分类 .....	(41)

二 “老汉”、“老婆婆”和“仔”、“仔媳妇”	(45)
三 “老年人”和“老几几”、“老娘子”	(47)
四 小结及对本书的描述框架的说明	(49)

## 第一部分 老年人与家庭

<b>第三章 家屋和分家</b>	(55)
一 老年人和“老房子”	(55)
(一)塘村家屋变迁	(55)
(二)家屋代际分配	(58)
(三)家屋分配与老年人的地位	(61)
二 分家	(65)
(一)分的必然性:子辈的策略——“顿”	(66)
(二)析产、“灶”、“散伙饭”:塘村如何分家?	(68)
(三)户口和门牌号	(70)
(四)分家前后和“家”的弹性	(71)
<b>第四章 塘村的养老和孝道</b>	(75)
一 “供老人”的方案和原则	(75)
(一)“称粮”和其他养老方案	(76)
(二)“供”的原则	(82)
二 塘村的孝道	(93)
(一)传统孝道与社会变迁	(94)
(二)塘村孝道的民间语汇	(96)
三 塘村孝道的行为结构	(102)
<b>第五章 衰老的文化过程和老年人的能动性</b>	(108)
一 家庭周期与衰老过程	(108)
二 “动员分家”和“培养责任心”	(110)
三 “招郎”	(116)
四 祖孙之间:家庭中的感情因素之一	(122)

---

五 平衡“大家”和“小家”:家庭中的感情因素之二 .....	(125)
六 老年人和变迁中的家庭关系 .....	(127)
(一)家庭与衰老的文化过程 .....	(127)
(二)乡村社会变迁和亲子“互为目的论”失衡 .....	(128)
(三)面对晚年 .....	(134)

## 第二部分 老年人与村落和跨村落社区

<b>第六章 评价、声望与乡村政治 .....</b>	<b>(139)</b>
一 “本事”、“能做”和“孬性”:社区评价与声望 .....	(139)
(一)“能做”的老人 .....	(140)
(二)“有本事”的老年人 .....	(141)
(三)“孬性”的老年人 .....	(148)
二 “声望老人”与“上访事件” .....	(153)
<b>第七章 “老年协会”与“走庙” .....</b>	<b>(160)</b>
一 “老年协会”、“打牌”和“说空话” .....	(160)
二 “走庙” .....	(165)
<b>第八章 “走庙”:行为和意义 .....</b>	<b>(172)</b>
一 “走庙”场景 .....	(172)
二 “走庙”中的一般行为 .....	(186)
(一)“念佛”和“拜忏” .....	(186)
(二)“请佛” .....	(187)
(三)“摆龙门阵” .....	(189)
三 村际交往和“走庙”的意义 .....	(189)
四 “竞争性交往”:“走庙”的圈子 .....	(196)
(一)跨村的竞争 .....	(197)
(二)村落内的竞争 .....	(199)
五 老年人的社区行为与社会变迁 .....	(201)

(一)不同的资源：乡村政治和信仰行为中声望的塑造 .....	(201)
(二)“走庙”、老年人和社会变迁 .....	(202)
<b>结论 .....</b>	<b>(206)</b>
<b>一 老年人与家庭 .....</b>	<b>(207)</b>
(一)分家制度 .....	(207)
(二)赡养制度 .....	(208)
(三)乡村孝道 .....	(209)
(四)老年人的能动性 .....	(209)
(五)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和老年人 .....	(210)
<b>二 老年人与村落和跨村落社区 .....</b>	<b>(210)</b>
<b>三 家庭和社区之间 .....</b>	<b>(211)</b>
<b>四 乡村老年人与社会变迁 .....</b>	<b>(213)</b>
<b>跋 .....</b>	<b>(215)</b>
<b>参考文献 .....</b>	<b>(219)</b>
<b>附录一 殷用祠序条规 .....</b>	<b>(228)</b>
<b>附录二 周敦家的“家仙菩萨”牌位 .....</b>	<b>(230)</b>
<b>附录三 塘村亲属称谓表 .....</b>	<b>(231)</b>
<b>附录四 竹镇“走庙”时间(一年)表 .....</b>	<b>(232)</b>
<b>附录五 塘村的“佛句” .....</b>	<b>(234)</b>